

米华◎著

新民与救国

——
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科技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新民与救国

——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

米华◎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民与救国：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 / 米华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12

ISBN 978 - 7 - 5438 - 5099 - 6

I. 新... II. 米... III. ①毛泽东思想 - 研究②民族性 - 研究 - 中国 IV. A841.64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8590 号

新民与救国——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

作 者：米 华

出 版 人：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李雄伟

装 帧 设 计：张 毅

出版、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nppp.com>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410005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贝特尔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200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730×960 1/16

印 张：17.75

字 数：272000

书 号：ISBN 978 - 7 - 5438 - 5099 - 6

定 价：36.00 元

营销电话：0731 - 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言：对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思考	(1)
第一章 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概述	(8)
一、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中的主题定位	(8)
二、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视野中的国民性及相关概念	(24)
三、理论框架与具体分析框架	(34)
四、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综述	(35)
五、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之不足与建议	(49)
第二章 从传统国民到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萌发	(55)
一、早年毛泽东的韶山岁月与他的传统国民特质	(55)
二、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萌发的社会历史条件	(67)
三、萌发时期的主要内容	(82)
第三章 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之逻辑发展	(98)
一、从“复古求解放”到中西融合造新民的转变	(98)

二、实现转变的社会背景	(115)
三、“变化民质”之内容	(124)
第四章 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范式之转换	(147)
一、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范式及其转换	(148)
二、从资产阶级新民到无产阶级新人的选择历程	(165)
三、新国民性改造范式下的主要思想内容	(180)
第五章 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历史地位	(198)
一、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历史特点	(199)
二、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在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中的地位	(213)
三、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启迪作用	(239)
四、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缺失	(260)
主要参考文献	(267)
后记	(272)

前言

对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思考

毛泽东——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毛泽东——一个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响亮的名字。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获得了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他是中国历史上千古难遇的全能型济世奇才，“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战略家，又是富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伟大诗人和独树一帜的书法家，他对中国人乃至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此，有关毛泽东的研究将是永恒的课题。

回顾此前国内对毛泽东的研究，大体可分为生平和思想研究两大部分。生平研究主要包括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及其历史研究，毛泽东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其历史研究，毛泽东的人际交往及其历史研究，毛泽东的家族及其历史研究等等。毛泽东的思想研究包括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毛泽东的个人思想研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历史较长，而对他个人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晚。追溯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就生平研究而言，周一平认为，萌芽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①。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虽然，五四运动时期，社会对毛泽东创办的报纸、写的文章有评论，已具有社会性，

^① 周一平：《毛泽东生平研究七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而非私下的议论，但充其量只能算做一般性的新闻报道，不是有目的的学术研究，不能称其为学术研究的萌芽。关于毛泽东生平研究真正的学术研究萌芽应该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算起，至今正好70年。通过70年对毛泽东生平的研究，相对而言，毛泽东生平研究的空间已经不大，除非中央档案馆大量的档案资料的解密，否则，深化研究难以为继，因为生平研究所需的研究资料很难有新的发掘。因而，深化对毛泽东的研究主要是深化对毛泽东的思想研究。就思想研究构成的两大部分言之，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尽管还有相当的研究空间，但真正要深化对毛泽东的思想研究，则又主要集中在深化对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的思想研究相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其研究范围就要宽广得多，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党建思想、外交思想、文化思想、伦理思想、经济思想、文艺思想、新闻思想、教育思想、体育思想、卫生思想，等等，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在国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直到毛泽东逝世后，从1980年代开始，毛泽东的个人思想的研究才得以全方位展开。国外对毛泽东的思想研究，由于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他们的研究起步早，研究范围广，研究层次深，研究方法新颖且多样化，重视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等，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虽然毛泽东研究的历史不算长，但他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人物，因而，人们对他70年的研究是持续不断的，每年都有大量的新的研究成果问世，这在当代人物的研究中是非常少见的。就研究成果论，仅毛泽东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何况还有不计其数的研究论文。但在众多的毛泽东研究成果中，既有高质量的研究精品，也有不少人云亦云、泛泛而论、缺乏新意的平庸之作，甚至存在真伪参杂的严重问题。纵观70年的毛泽东研究积累，一方面为深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求突破毛泽东研究的现有瓶颈向纵深发展。因此，深化研究势在必行。而且，深化研究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深化。对此笔者不惮冒昧，谈点粗浅看法，权当抛砖引玉。

1. 要校正毛泽东研究的价值坐标。由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倡导者和

创建者，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一位伟大的政治人物，因此，以往对毛泽东研究的价值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即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一价值取向对于研究他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人物，对于中国现实政治环境下的中国学者来说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的历史功绩主要在政治领域，研究他自然能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当代中国学者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通过研究毛泽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为现实政治服务不是毛泽东研究的唯一目标，如果把它当成唯一目标，深化研究就无法进行。以服务现实政治为唯一目标而否定更为根本的价值目标的存在，就会导致学术研究发展不起来，那么，更为根本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增加民族智慧、丰富民族文化内涵作为毛泽东研究的最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为什么老子、孔子等思想家的研究能够绵延两千多年而经久不衰？这是因为对他们的研究除了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服务外，研究者始终把增加民族智慧、丰富民族文化内涵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我们也必须承认，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人物，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哲人、智者，他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交等等领域，都表现出超人的智慧，只要我们适当的校正研究的价值坐标，不仅能增加民族智慧、丰富民族文化内涵，而且还能使毛泽东研究长盛不衰、绵延不绝。为了达到增加民族智慧、丰富民族文化内涵的目标，就要求人们尽量使毛泽东研究学术化。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轻率地否定、抛弃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价值取向，其实，为现实政治服务也是增加民族智慧、丰富民族文化内涵的一种表现形式，二者并不矛盾。针对目前国内毛泽东研究重政治性而轻学术化的现状，必须强调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研究不能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要追求学术价值，要在学术上站得住。学术不是政治的婢女，二者并行不悖。如果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而随意歪曲历史，甚至伪造历史，这就会走向历史的反面，走向历史科学的反面，即走向了伪史学，最终要被唾弃。“文革”时期的毛泽东“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2. 加强毛泽东研究的学科建设，建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毛泽东学。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当某一学科中的某一问题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且持续不断，社会又有反复研究需要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就会形成一门新的分支学科，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诞生就是例证。长期以来，毛泽东研究在国内主要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中共党史二级学科的一个研究领域，当然，其他学科如历史学、文艺学、哲学等也有相关研究。毛泽东研究已有70余年的历史，研究人员之多、成果之丰富、研究领域之广泛、研究的社会基础之深固，都是《红楼梦》研究无法企及的。应该说，国内毛泽东研究建立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毛泽东学”的条件已经具备。而且，也十分必要。因为，此前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对毛泽东的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如研究成果良莠不齐，甚至有歪曲历史、伪造历史的现象存在；又如研究的商业化倾向，1980年代后期，伴随“毛泽东热”的兴起，有关毛泽东的图书在市场上成为卖点，由于利益驱动，出版了大量的粗制滥造的与毛泽东相关的书籍，严重扰乱了毛泽东研究的正常开展；又如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劳动的现象，就毛泽东思想研究而言，著作和论文的重复现象都十分严重，不同作者、同一书名的著作有的多达十几本，有的同一题目的研究论文在网上点击多达数十篇，而内容却大同小异，观点也鲜有推陈出新，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几乎没有突破。就毛泽东生平研究言之，学术著作的重复不算多，通俗性著作的重复却不少，研究论文的重复同样严重，如此重复劳动是对毛泽东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状况如不杜绝，毛泽东研究又如何深化？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要重视毛泽东研究的学科建设，如确定毛泽东学的学科性质、学科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体系等；建立全国性、民间性的毛泽东研究学术团队，统一毛泽东研究的话语体系和学术规范，运用话语体系和规范体系把非学者排除在毛泽东研究的队伍之外，确立毛泽东研究的准入机制；以“求全”、“求真”的标准收集和整理毛泽东研究资料；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构建新的分支学科等等，这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的。

3. 要提倡研究方法创新。研究方法创新是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关键所在。前面提到的要校正毛泽东研究的价值坐标、加强毛泽东研究的学科建设等都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如何深化毛泽东研究的问题，而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上，方法创新当然就相当重要。因为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研究历史人物要想取得突破，只有不断地发掘新的史料，从70余年毛泽东的生平及思想研究史看，除非档案资料的解密，否则很难再发掘新的毛泽东研究资料，而档案资料的解密是

有规定的，我们不能坐等档案资料的解密而中断毛泽东的研究，因此，只有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对现有资料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研究以得出新的结论，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才能实现毛泽东研究之深化。如何进行研究方法的创新？我想首要的问题是观念的转变，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而不敢大胆进行研究方法的创新，似乎一旦用新的方法研究之，就会有辱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者形象、玷污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这种无形的压力制约了毛泽东研究方法的创新。其实，在历史研究中，自1980年代以来一些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继被介绍到历史学界，有人开始尝试并运用到具体的研究中，如系统论、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计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心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等等，先后被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产生了一些有份量的新的研究成果。但毛泽东研究领域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相对滞后些，成果相对少些。因此，作为毛泽东研究者应排除种种顾虑，只要站在客观公正、增加民族智慧的立场上，是可以尝试各种新的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是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毛泽东，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多了解、熟悉并掌握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新的理论方法。至于哪一个学科的方法更合适，主要由研究内容、研究目标而定，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另外，国外一些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方法，我们的毛泽东研究也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如日本学者村田忠禧用计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法就值得我们借鉴。他在中国《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的《通过对字词使用的计量分析研究中共党史——以政治报告为素材》（1999年第4期）、《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2002年第3期）、《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词语变化看十六大的特点》（2003年第1期）等就是运用计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中共党史学界的广泛认可，这种方法是否可以引入毛泽东研究，值得我们去思考。但毛泽东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似乎还未见到过。

需要指出的是：国外的毛泽东研究方法并不是我们进行毛泽东研究方法创新的灵丹妙药，有些方法是缺乏科学性的，因此必须要学会鉴别，切忌照搬照抄，否则，就会闹出现代版的东施效颦的笑话来。如国外比较流行的个体心理分析的方法，他们用这种方法研究毛泽东得出很多不正确，甚至错误的结论。

国内一些学者觉得新奇，不加鉴别地跟在外国学者屁股后面吆喝早年毛泽东有强烈的“自卑情节”、“恋母情节”等，并提出早年毛泽东的“仇父恋母情结”成为他作出背离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精神的另一种文化选择的心理基因。这种把“谦虚”、“孝顺”等传统民族文化心理影响下形成的行为方式，做个体心理分析是不可取的。对此应做社会心理学研究而不是个体心理分析，而毛泽东研究领域至今较少有人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因此，应大力提倡。

总之，正因为毛泽东研究方法创新相对滞后，所以需要多一点鼓励，允许失败，不能讥讽，更不能扼杀。

4. 要选择好深化研究的突破口。如前所述，毛泽东研究大体可分为生平研究和思想研究两大部分，生平研究主要是事功研究，在70年的反复研究之后，要取得很大突破的确有困难，而思想研究的突破也主要在他的个人思想。就他个人的思想研究言之，其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党建思想、外交思想、文化思想、伦理思想、经济思想、文艺思想、新闻思想、教育思想、体育思想、卫生思想等领域都有众多的研究成果问世，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只涉及某个单一的思想领域，缺乏融会贯通的整体性把握，总让人感觉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从总体上把握其思想精髓。因此，把他对各思想领域的思考进行有机联系的研究可以作为深化毛泽东研究的突破口。这就需要找到一种与各领域思想都能发生联系的思想，才能进行融会贯通地研究，才能有所突破。到底有没有这样一种思想？答案是不容置疑的，如他的哲学思想是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考，肯定能统揽全局，政治思想也与其他更为具体的思想有关联，但两者都不是理想的突破口。因为，一方面，这两种思想都有过较深入的研究，无论把哪种思想作为突破口都会造成重复劳动，浪费研究资源。另一方面，其他具体领域的思想研究也或多或少的与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相联系，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仍缺乏系统的、融会贯通的整体性效果。因此，只能另寻他途。笔者认为，被学者们长期忽略的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可作为深化研究的突破口。因为改造全体国民的社会性格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的整体性变迁，必然与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党建思想、外交思想、文化思想、伦理思想、经济思想、文艺思想、

新闻思想、教育思想、体育思想、卫生思想等发生关联，可进行融会贯通的整体性研究。

正因为笔者认为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是深化毛泽东研究的突破口，因此，想在这一研究领域做一些尝试。鉴于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本研究只探讨早年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至于早年毛泽东有没有国民性改造思想？国民性及相关概念如何界定？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其发展历程以及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历史地位等问题，将在本研究中逐一回答。

第一章

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概述

从1910年秋走出韶山到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10余年间，毛泽东无论在国情民性，抑或哲学、伦理道德、政治、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思想的积累。如果从哲学层面，用矛盾分析法来梳理毛泽东早期思想内容，把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作为一个矛盾体，应该说有一个居决定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思想主题的存在，它规定和影响其他被支配的、处从属地位的思想内容的存在和发展。因此，要科学地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确定其早年思想主题就势在必行了。那么，毛泽东早期思想主题是什么？研究状况如何？应怎样进行深入研究？都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一、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中的主题定位

早年毛泽东是时代狂涛陶冶出来的青年思考者。他出生于维新变法的年代，成长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狂飙巨澜的时代，导致社会思潮的跌宕起伏，也引领着早年毛泽东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断思索。改良与革命、中学与西学、宪政与共和、“大一统”与“湖南共和

国”、唯心与唯物、新村与新民、道德内修与张扬个性、问题与主义等等多元思想积累，成为他日后从事革命与建设事业不竭的思想渊源。同时，这种思想积累连同他的早期能力、意志品质等的积累，又是他成为一代伟人的原始积淀。按理说，这种思想积累早应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战乱年代，人们似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他的早期思想，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他的巨大威望、影响力和权威，人们逐渐把他当成神的化身而捧上神坛。既然是神，那当然得十全十美，不允许有任何的亵渎和不恭，因而，早期多元化思想积累自然不便研究，否则就有损伟人与生俱来的高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从而使得人们一方面自觉自愿地为维护领袖的形象而不去触及他的早期多元化思想，另一方面，也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引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在他离世不久，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初步的政治评价，褪尽了缠绕在他身上的层层神秘莫测的光环，毛泽东从隔膜的“天国”回到火热的人间后，学界学人对其早年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寻找什么，证明什么。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仍存在较大的深化研究的空间。

1. 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存在的不足

自王兴国等人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问世以来，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已有近30年的研究历史（不包括此前以生平研究为主的某些思想性研究内容），学者们在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的铺垫性工作，为深化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某些具体思想领域的研究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如汪澍白在早期哲学思想、萧延中在早期政治思想、黎允泰在早期文化思想的研究等，就微观、单一的思想领域研究言之，他们的用心都很深。但如果从宏观、总体上考察，所有这些研究（包括生平研究）又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

首先，表现为随意性倾向，即从已有的观点出发到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寻找根据。这种倾向又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人们总以后来毛泽东的巨大成就来寻求某种预设性的前在因素，以便于证明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领袖，在其早年就已经明显表现出伟人的思想素质而随意拔高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毛泽东早

期生平研究中居多，如“为了寻找‘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途径，毛主席偕同蔡和森等革命同志，建立了新民学会”^①，事实上，在新民学会的建立上，毛泽东与蔡和森之间并不是偕同与被偕同的关系，等等。而这样竭尽全力地维护毛泽东的伟人形象的做法，就会把那些不利于这种证明的事实加以清洗或置之不顾，就会得出不客观甚至不正确的结论。第二种表现则正好相反，试图从早期思想中寻找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思想根源而随意贬低的倾向，如有人就把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归结到他早年确立的“动”“斗”宇宙——人生观上，“‘不破不立’，‘一分为二’，‘斗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毛早年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继续”^②。这两种随意性使得部分学者，特别是某些国外学者，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说他是一个传统固守主义者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极端的唯意志论者或一个辩证法专家；一个英雄崇拜者或一个真心同情民众的民粹主义者；一个经验理性主义者或一个沉醉于乌托邦的空想家。而且在每一种说法的背后，似乎都可以寻找到某些事实的依据，寻找到足以支持各自判断的毛泽东本人的言论或文本依据。

其次，是对其早年思想主题概括的多维性倾向。学人反复利用相同的文本材料和背景材料，从不同角度去研究他的早期思想，虽拓宽了研究领域，但相同的材料却能同时成为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文化思想等等的佐证，甚至得出相左或相反的结论，使得这种研究有如雾里看花，水中赏月，深感不能突出其早年思想主题。然而，这样一来，对立的似乎是不容调和的各种思想倾向就杂乱纷呈地聚合，从而掩盖了早年毛泽东思想变化的历史性，也使得一个完整的、鲜活的青年思考者的形象被支解，妨碍了人们发现支配着早年毛泽东基本行为走向的思想主题。因此，确立其整个早年的思想主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① 蔡畅：《缅怀向警予同志》，载《纪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周年》，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

^②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2. 国民性改造思想是毛泽东早期思想的主题

那么，贯穿其整个早年思想的主题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他的早年国民性改造思想。这是因为：

首先，国民性改造思想是毛泽东早期思想的逻辑起点。近代中国在经历鸦片战争惨败后，近代仁人志士们便开始了御侮图强的民族复兴运动。在器物层面的努力收效甚微之后，又着力寻求制度层面的突破，结果还是殊途同归。20世纪初，思想先驱们开始改变原先由器物 and 制度层面的楔入，进而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从中西间的形下比较，进而看到了西方近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提出了改造民族文化心理的命题，即国民性改造。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这种逻辑思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已有所认识。1916年陈独秀就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种选择历程，他说：“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如果说陈独秀的概括还有点模糊，那么，梁启超于1922年的归纳就更加清晰了。他认为：“近五十年来，中国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起来了；第二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地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适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②从这一观点出发，早年毛泽东正处在中国近代化的第三期道路上，即改造由中国传统文化陶铸的国民劣根性，寻求人的近代性转换。一般而言，思想史的发展犹如田径赛中的接力赛，你必须接过前一个人递过来的接力棒而奋力前行，完成该由你完成的历史使命，因此，早年毛泽东接过梁启超等人传递过来的国民性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新青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②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版，第4020—4021页。

改造之思想接力棒，作为其早期思想的逻辑起点，去寻求中国的近代化的正确道路，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不可能也不必逆历史潮流而动，或重走近代进化路。由此观之，其早年国民性改造思想是他早期思想的逻辑起点。

就逻辑起点言之，有一个尚需说明的问题：严格地说，第三期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应该在变法维新之后，而不是像有的学者那样，把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追溯到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①，也就是说，梁启超才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始作俑者，标志性的成果便是连载于《新民丛报》的《新民说》。但是，在国民性改造思潮兴起不久之后的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思潮骤然兴起并占据上峰，打乱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发展步伐，国民性改造思想一度偃旗息鼓，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按理说，1910年前后的毛泽东生活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思潮之中，耳濡目染革命气息，接受的应该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潮，投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之中，而他却隔代承继梁启超等人的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这又是为什么？一方面，是由于他早年个人成长条件的制约，这一问题将在“历史起点”中回答。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思想可以超越社会存在，人的现代性转换思想即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是超越中国当时社会现实存在的一种先进社会意识，历史实践证明，这是几代中国人用“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的宝贵经验和血的教训。但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是不被允许人们从容地进行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换言之，近代中国不具备国民性改造的现实条件，因此，我们不能否认这一思想的先进性。这里实际上又回到后来在学界引起争论的“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问题上，“救亡压倒启蒙”论虽然较真实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却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近代中国的确需要思想启蒙以唤醒人们的普遍觉醒，但更需要救亡图存，在救亡中启蒙，只有通过救亡与启蒙的双向良性互动建立起一个真正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才可能允许人们从容地进行人的现代性转换运动。这也是早年毛泽东在接受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之后，又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但很快又回到学校思考中国要“变化民质”的深层次问题，

^① 俞祖华：《深沉的民族反省——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